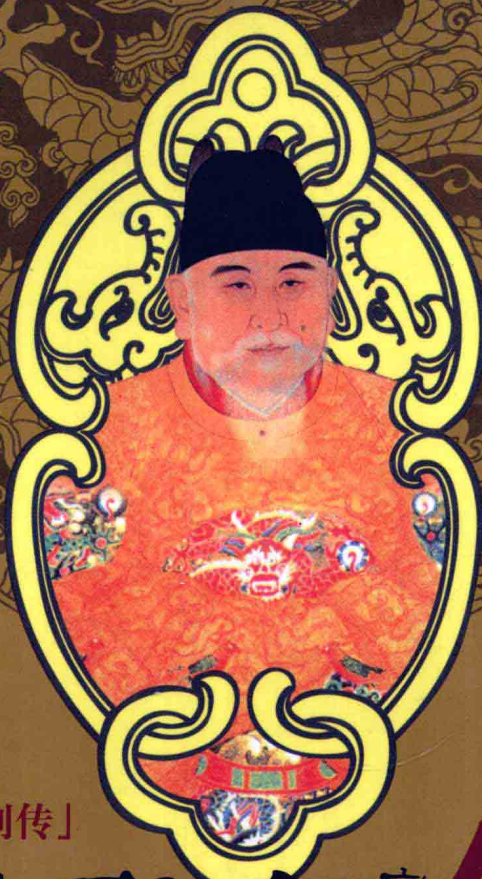


孙文良 著



「明帝列传」

洪武帝

皇帝

传

上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明 帝 列 传

洪 武 帝

(上)

孙文良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前 言

洪武帝，朱元璋，一个传奇式的历史人物，元末明初社会大动荡时代的弄潮儿。在他生活的半个多世纪里，从一贫如洗变成富有天下；从默默无闻的微贱小民到一跃成为赫赫大明天子，实在值得探讨，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认识洪武帝这样的历史人物，首先就应该知道他的这一最大特点：他不是既定的皇位继承人，完全是个人奋斗来的一代大明帝国创造者。他本来是大元帝国的臣民，而且大元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其空前统一，打开中西交通，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等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只是到了末年，一切矛盾总爆发，才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绝境。也就在这个时候，将其彻底埋葬的这个人物降临到了江淮一户贫民之家了。

洪武帝生于元天历元年(1328)，乳名重八，大名兴宗，又改元龍，字国瑞。他的先世曾住江苏沛县，几次迁徙，无有定居，至朱元璋诞生时已流落到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他生来体弱多病，家里极端贫穷，出于对未来的憧憬，为他出生前后编了许多神乎其神的佳话。如说他出生后，家里夜间总有火光。或说，他小时候有病，欲将其许给庙上，恰巧僧人不在，抱了回来。可是后来不是有人说他家“有一龙”，就是说将来会荣华富贵(《天潢玉牒》)。各种说法无非是给其未来加上个神圣的光圈。

可是无情的现实使那个神圣的光圈黯淡了，一是眼前的



生活悲惨之极；二是朱元璋不靠幻想，而是奋起搏斗。朱元璋出生时的元朝末年，国是日非，从皇帝到诸王大臣，只顾争权夺势，搜刮钱财，醉生梦死，昏昏噩噩。朱元璋的家，同广大人民一样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按元朝的规定，他的家原来当过淘金户，本地不产金，要到别的地方买了金子交纳，因此越发贫困。后来迁到安徽几个地方从事农业，仍然摆脱不了厄运。朱元璋来到世上，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他的童年为人放过牛，进了校门，虽很聪明，却没有钱读下去。最悲惨的是17岁那年，遇上了天旱和瘟疫，1个月内，父、母、长兄被夺去了性命。家里穷得没有一块墓地为3位亲人葬身。惨还惨在船破偏遇顶头风，他自己孤苦伶仃，投奔皇觉寺为僧，到寺上没过两个月，因年饥岁荒，寺主封仓，又被迫到外地云游乞食去了。自东往西，由南到北，到过安徽、河南的庐、六、光、固、汝、颍诸州。路上“朝望突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跼。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御制皇陵碑》）岁月蹉跎，过了3年的乞讨生活之后又回到了皇觉寺，想要立志向学，却处在农民大起义的前夜了。转机来到眼前，朱元璋做了慎重选择。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黄河连年决口，危害了元朝的漕运和盐场之利，诏开黄河故道，共280里。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利用这次治河的民夫聚会和不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

他们以红巾为号，称红巾军或红军，得到各地人民广泛响应，锐不可当。官军奉命镇压，屡战屡败，起义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赤帜蔽野而盈岗”。时人把元朝的腐败和农民起义有关的几件事编出歌谣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



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南村辍耕录·醉太平小令》）大起义的第二年，定远人郭子兴起义，攻占了濠州，官军随之前来镇压，起义军在城里，官军驻城外。起义军免不了对既有的社会秩序进行破坏，奇怪的是官军公然杀良民冒功领赏。25岁的朱元璋面对身边两种势力的逼近，必须作出选择了。先是起义军中有人劝他参加，曾犹豫不决，等官军来了又使他大失所望。站在十字路口上，想到向寺上的伽蓝问卜，卜了3次，问逃、问守皆不吉，只有参加起义最吉。这是朱元璋一生中极关键的一次选择，是否最后由问卜决定，当然可以研究。即使如此，也不过说明他经过反复思索，慎之又慎。问卜之后，即投身起义，参加了濠州的郭子兴部的红巾军。

机遇和才能结合造就的是光辉前程。他在郭子兴部下表现出色，得到信任，很快由亲兵升为九夫长、镇抚，总军事。意外的收获是，郭子兴见朱元璋才能出众，决定把义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他不但得到了一位贤内助，而且使他的地位变得特殊了。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奉韩山童之子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今安徽亳县），国号大宋，建元龙凤，成为联络和领导各支起义军的中心。朱元璋被授为左副元帅，他接受了龙凤年号。同年，郭子兴因与部将孙德崖等矛盾，怏怏而卒，朱元璋即代领这一支起义军，所谓“滁阳一旅”，奠定了未来大业的基础（《明史·郭子兴传》）。龙凤二年（1356），渡江，攻克元在南方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重心集庆（今南京市），而后称吴国公，并以此为根据地，征伐四方。他英明的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一方面在南方打着龙凤旗号坚持反元；另一方面凭借北方韩林儿、刘福通所率起义军同元朝作战的机会，消灭反元大起义崛起的群雄，主要是优



居长江上游的陈友谅和富甲一方的平江(苏州)张士诚。《明史》对此有个较为公正的说法:“元之末季,群雄蜂起。子兴据有濠州,地偏势弱。然有明基业,实肇于濠阳一旅。子兴之封王祀庙,食报久长,良有以也。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借其力焉。帝王之兴,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夫岂偶然哉。”(《明史·刘福通、韩林儿传赞》)

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朱元璋周围有徐达、常遇春、胡大海等猛将云集;又有李善长、刘基、宋濂等群贤毕至。朱元璋注意发挥他们每个人的优长,但又总是显得他个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徐达自被任命为大将军,就戒之“毋焚掠杀戮”,常遇春虽“摧锋陷阵、未尝败北”,但朱元璋时时提醒他“克城无多杀”(《明史·徐达、常遇春传》)。胡大海领兵在前线作战,儿子在京犯酒禁,有人怕大海不满,阻止处罚。朱元璋却说:“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亲手斩之(《明史·胡大海传》)。为削平群雄,刘基建议先攻陈友谅,再灭张士诚,被采纳;但对待龙凤政权的关系,朱元璋一直不顾刘基的反对,既奉其年号,又与之保持联系,终于有效地利用了其强盛一时的巨大力量。

正确评价登极为帝,创建大明国的意义。朱元璋在军事上依靠“濠阳一旅”,攻打天下,在政治上假龙凤政权之号,由元帅而平章,而丞相,自己则从吴国公(1356)到吴王(1364),逐步当上了皇帝。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但是有积极意义。龙凤十一年(1366)小明王死后,改元吴元年(1367)。就在今本,平定张士诚,然后命徐达、常遇春率师 25 万由淮入河,北伐中原。第二年(1368)正月四日,元朝尚未灭亡之前,朱元璋于应天(南京)之南郊祀天地,即皇帝位,建国号明,建元洪



武。过去的农民军统帅朱元璋成了名符其实的洪武帝，一代大明宣告诞生。同年闰七月，元顺帝离开大都（北京）逃走，元朝灭亡，明军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又经过 20 年，统一了全国。《明史》毫不夸张地描绘了洪武帝创建的大明帝国，称：“明太祖奋起淮右，首定金陵，西克湖、湘，东兼吴、会。然后遣将北伐，并山东，收河南，进取幽、燕，分军四出，芟除秦、晋，迄于岑表。最后削平巴、蜀，收复滇南。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来，所未有也。”（《明史·地理志》）

农民起义领袖当皇帝是反封建革命的一种结局。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的一天，与群臣讨论礼乐之兴否，洪武帝说：“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礼乐之文粗备，而政治不能为古，揆德凉薄故也。”侍臣当场为其统治的 30 年进程及其成就作了这样一个概括：“陛下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风，咸蒙至化。所谓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真有奇效矣。而圣德谦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于前代也。”（《明太祖实录》卷 239）这段评论基本反映了历史实际，所差的是过于简略，或把平定祸乱与求富、求和孤立起来了。如第 1 个 10 年主要是扫除元朝的反动腐朽势力，削平群雄和镇压新的反抗。但是从洪武元年到十年，作为大明帝国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一段，除其以上主要任务外，还建立了各种制度，如沿元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以为政府中枢。又置御史台，设左、右都御史，掌监察。先置枢密院，后改大都督府，掌军旅，其设官屡经变化。其法制、军制，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培养人才的学校等都在这个时期相应地建立起来了。这就是洪武帝所说的“立纲陈纪”（《明史纪事本末·北伐中原》）。同时，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

明朝建立后的第 2 个 10 年，确乎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下



了很大力气,尤其是初期和其后不断实行的奖励垦荒,减免租赋,徙民屯田,兴修水利,便商轻税等积极措施不断地产生出了效果。《明史》上说这时“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余万。”(《明史·食货志》),据统计,洪武十三年,全国新垦土地共增加了180余万顷。土地开垦,粮食充足,后来下令各地设粮仓,谕天下有司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廩以贷民,然后奏闻。”(《国榷》卷10)可谓“富之”了。然而经济之外的重大措施,这时候采取的也不少,如“胡党之狱”,就是洪武十三年兴起的一件政治大案,不但该事件本身延续十几年,还影响到政治制度上的一系列大变化。从此废掉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又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可以说洪武帝对元朝典章制度的改革,至此才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因为洪武帝越来越强调他是一代大明朝的开国之君,即不但要推翻一个朝代的统治,还要为新的朝代创造一套不同以往的制度,让后来的子孙万代相传。为此,当军事进攻还没有停止的时候,就已经着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了。他在进行所有这些活动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念头,就是他过去的贫困生活和参加起义的经历,反映农民起义的深远影响。

洪武帝的一生,总的来说一直都活得很不轻松。当皇帝之前,整天为贫穷困扰,东奔西跑,舍生忘死,追求从他降生时候就盼望实现的大事业;登极之后,真的当上了皇帝,立刻就为另一种富贵所累的时候开始了。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忙于处理政事,更多的精力要放在考虑和决定长治久安上。应该说,经过他的努力,到洪武二十年以后,和平的时期来到了,比起以前的大动干戈,相对安静多了。北元逃到了遥远的塞外草原,或打或和,基本上是明朝掌握了



主动权。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租税剥削虽没有从根本上取消,可是遇有水旱等天灾,有时能够减免,甚至还能发放粮食钱钞进行救济,原来经常被天灾人祸逼上梁山的人民反抗,大为减少。贪官污吏,受到了严惩,一般地也知道有所警惕。洪武二十年焚锦衣卫刑具,诏罢锦衣卫狱(《明史·职官志》),严刑不用了。科举、荐举等多种形式选拔人才;尤其是在中央设国子学,地方设府州县学,大兴教化,以达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明史·选举志》)说这些是和平时期的景象,不无道理。而洪武帝一个空前的举动更增添了和平的氛围。这就是,洪武二十七年八月,秋高气爽,五谷丰登,作为当了将近30年皇帝的他,要与民同乐。下令在南京城搭起15座大酒楼,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二十三日那天,他本人在醉仙楼开怀畅饮,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应该把洪武帝走过的道路看作是成功的。无论是和以前的历代皇帝比较,还是对后世影响而言,他开创的事业都应予以充分肯定。明朝当代人总愿意把他和汉高祖刘邦相比,但是说他比刘邦的成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化、弘治年间的学者谢铎说洪武帝有超过前代帝王之功者,共5件事:“攘克夷狄,收复诸夏也;肇基南服,统一天下也;威加胜国,锋刃不交也;躬至创业,临御最久也;申明祖训,家法最严也。”著名的史学家王世贞称汉高祖之功胜过汤武,洪武帝之功胜过舜禹;“夫汉高之功,一世功也;高帝(洪武帝)之功,万世功也。”明末陈于陛更为具体的指出:“太祖(洪武帝)虽得天下易于汉高,而经理太平之业,几百倍有三焉:其一,高祖不数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纤悉具备,无以加矣;其二,汉高虽承秦火,大抵因袭秦敝,太祖扫胡元而复帝王之制;其三,高



祖犹有诸臣，太祖无辅相，自圣心神画者独多也。”（《国榷》卷11）本朝的人，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的评论或许夸大其词，有歌功颂德的成分，但基本事实没有失真，谈得符合实际，还可以找到反证，中国历史上常常是后代否定前代，但代替明朝的大清却很奇怪，不仅清太祖、太宗大量采用明朝的制度。最突出的是顺治帝，超乎寻常的对洪武帝备加赞扬。顺治十年（1653）正月的一天，他向满汉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提问：“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大家回答：“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说：“唐太宗似过之。”顺治却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范文程等当场表示赞同（《清世祖实录》卷71）。顺治帝对洪武帝这种推举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即反映了洪武帝本身是所有著名君主中其成就无与伦比，同时，清朝也在很大程度中继承了由洪武帝一手创建的规章制度。

至此，又要说到另一个方面，就是洪武帝还有不足和遗憾。在他参加农民起义军不久，曾向李善长询问：“天下何时定？”李善长没有说明多长时间，只提醒汉高祖“五载而成帝业”，要他“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按照他的说法，完成帝业就算天下安定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洪武帝登极，天下没有安定，他当了皇帝之后，经过一二十年也没有完全安定。洪武帝的危机感那么强烈，绝不是徒然的，社会的确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不仅有“南倭”与“北虏”的威胁与侵扰，还有内地与边疆的人民反抗，都使他不能高枕无忧。他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因此甚至遭到当代和后世普遍批评，想了许多办法让



后来者知所警惕，可是金钱的诱惑，始终不能阻止一些人铤而走险。洪武帝为此大伤脑筋。他还觉得开国以来的文臣武将不可靠，大开杀戒，兴胡党之狱、蓝党之狱，前后沿续 10 余年，元功宿将被牵连而杀者共 3 万余人，并把自己的 20 多个儿子封为亲王，让他们手握重兵，镇守要害，出乎他的预料竟埋下了诸王争夺皇权的祸根。洪武帝早年的贫苦经历，影响他在当皇帝之后，确实曾想使所有的人不再像他过去那样在苦海里挣扎，但直到晚年仍找不到摆脱穷困的良丹妙药。他解释不了这一切的社会根源，而我们可以说清了，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当生产力还没有提高到足够的水平，私有制继续存在，剥削压迫仍在作怪，所谓和平，廉政，共富等理想，只能是幻想。更何况洪武帝本身实质上也没有那种纯正的理想了。



悼念文良老师

——致读者

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文良先生与世长辞了。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洪武帝》，是他的一系列明清史著作中最新的也是最后的一部心血之作。

1995年1月8日，他刚写完本书的最后一页——《后记》，未及喘口气，就对全部书稿再加工润色。适值春节到了，只有正月初一这一天，他同全家共享节日的欢乐，而从初二开始，他抛开家人，不舍昼夜，兼程而作。家里人都知道他的脾气，不敢劝阻他，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轻轻地招呼一声。文良先生连续工作到正月十四，全部书稿通改一遍，最后杀青，长长吁了一口气：“太累了！”接着，他就病倒了。在医院二个多月，日夜抢救，终因身罹绝症，医治无效，不幸于4月25日19时38分溘然长逝。终年只有62岁，而这部《洪武帝》竟成了他的绝笔。

文良先生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明清史专家。还在50年代中期，他就学于名师赵光贤、白寿彝先生的门下。赵、白两先生都是国内有数的老一代历史学家。文良先生得其真传，于先秦史、明清史典籍皆称娴熟，钩沉史籍，游刃自裕；学术底蕴雄厚，才思泉涌，有口皆碑，誉为史学“才子”。俗云：名师出高徒。文良先生不愧称为赵、白两位名师最得意的门生之一。



在北京师大读研究生专业期间,已显示了他的优良史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被指名参与由已故史学大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的编纂工作。由他执笔撰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留下了他的一家之言。1959年,研究生学业完成后,调到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专攻明清史;迄至去世,已近40年,教学、科研、行政集于一身,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未有一日之废。

自“文革”前,延至“文革”后期,先生一直在明史及清开国史这一领域驰骋,如《明末辽事问题》、《萨尔浒之战》、《论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关系》等论文,其立论及观点,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引人信服的真知灼见。他写道:“辽东之得失,实系明朝之安危”,“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这些结论都写于二三十年前,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不易之论。

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先生的学术也开始了辉煌的创造。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学术界尚未从以往的束缚中完全摆脱出来,他已冲出“起跑线”,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奋力开拓,一发而不可收。我作为他的学生,首次同他合作撰著《清太宗全传》。他估量选题的价值和将采学术界的评说,就预言:“我们成功于斯,亦失败于斯,但我想会成功的!”果如其言,1983年一出版,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强烈反响,连印两版,几近10万册。日本清史学者细谷良夫著文《关于清太宗全传》,指出:“此书是‘肖一山著《清朝通史》以来最值得重视的一部书’,它之出版,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新动向’。在国内,继此书之后,遂有清帝系列传记相继问世;同时,清前史研究也掀起了热潮。该书在新时期对清史研究的开拓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还在《清太宗全传》的书稿一交出版,我



们又马上转入对明清战争史的研究。这个课题是先生提出来的。我们一鼓作气写出《明清战争史略》，第一次给予明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事斗争做了系统而完备的评述。其后，我又协助他主编了《满族大辞典》，为国内第一部少数民族的百科全书，再获重大学术影响。他自著《明清人物》、《中国古代官制史》（台湾），以及与他人合著的《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等10余部著作连续问世。1992年，刚应六旬之虚龄，辽大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是他30年来发表的满族与明清史论的精品结集，同时又补写了部份内容。可以说，这部文集集中代表了他数十年研究满族崛起及清开国史所形成的系统的学术思想，显示了他在这—研究领域所达到的水平和深度，不能不居于领先的地位。

12 在新时期的10余年中，平均每隔二年，他就推出一、二部新著，其间，还有诸多论文之作。作为一名教师，他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担负着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负有系主任、校教务长、省史学会会长等行政工作，参与校内外及国内外学术活动，而著述之丰，速度之快，适足以令人惊叹。可以想见，他用功之勤，毅力之顽强，个中艰辛备尝，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

先生向以治学严谨著称。他不但精于考辨史实的真伪，而且善于从别人所忽视的角度提出问题，从理论上给予回答。他不循传统之成说，不囿于已有之定见，其一文一书都贯彻了学术创新的丰富的思想。前面提到的部份著作和论文，都是他独辟蹊径，对明清史研究领域的新开拓，立意深邃，观点“领异标新”，论证细密，几令人无懈可击！即使如合著的《乾隆帝传》，是在已出二种版本以后完成的，却没有因循他人的痕迹，写出了个人的新意。



在先生撰著这部《洪武帝》以前,早在40年代先由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写出一部《朱元璋传》,近10年间,又连出二部新传记。继他们之后,再为之立传,不论哪一位专家,都会有难以为继之憾。据我所知,文良先生久有为朱元璋做传的冲动,欲一申个人的学术之见,终因事繁而未达其志。恰巧吉林文史出版社计划出一套《明帝列传》丛书,位居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是不可或缺的。该社即商请先生主笔,他不稍迟疑,欣然应允。我曾担心,他能否跳出学术界已有的构架。他胸有成竹,胜券在握,说:“我对朱元璋早有自己的想法,现已出版的传记我可以不看,决不会与他们的雷同。”信矣!当我展读他的书稿,并与已出的朱元璋传稍作比较,便发现从体例到内容,从选取的侧重点到每一个问题的阐述,以及表述的方式,完全是他个人的匠心独运,提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学术思想,建树了他心目中的朱元璋的崭新形象。

他循着朱元璋的人生旅程,展开了朱氏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的生命画卷,将其人生划分为两个大阶段:前半生浴血奋战,创建明王朝,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历史交替;后半生创建一代典章制度,为其子孙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稳固的统治根基。总括其一生,艰苦创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特别指出,朱元璋能够取得成功,是才能与机遇的结合,造就了他的辉煌前程,建立了一代伟业。总结历史经验,透视人生的意义,以及对人生的深刻体察,贯彻于全书的字里行间。深刻的思想,只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达。他之为文,恰似行云流水,酣畅无滞,且跌宕起伏,如一首优美的旋律,无韵的散文,回味无穷。他把深厚的文学素养灌注于史学著作,绘声绘色地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所以,读他的书或文章,确实感受到史学美的享受。



先生毕生致力于明清史教学和研究,对历史科学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充满了真知灼见。他认为,历史就是昨天乃至前天的现实。历史学家的责任,不只努力恢复和再现历史的真貌,更为重要的是,对历史或人物给予科学的阐释。因此,在他的笔下,原已僵死的历史或人物,都变成了鲜活的“现实”。由此,他进一步引申出对历史科学的认识,一再阐述他的论断:历史就是政治,是最生动的政治教科书,也是滋养人生的教科书。不懂历史,就不懂人生,不懂政治,就不成其为政治家。在这里,他透露出“历史政治学”的新概念和理论构想。…这些极富创意的新思想,恰是科学地界定了史学的巨大功能和价值。

14 先生的一系列著述及其学术思想,展示了一个真正学者的风范,史学大家的气度,因而奠定并确立了他在国内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他当之无愧。

先生撰写《洪武帝》,接近完稿时,已患重病在身,却全然不觉,每至晚上,劳累了一天,从下肢到脚都已浮肿,只用温水浸泡,以图缓解。次日,如有课时,授完课,回到书斋,继续笔耕。当书稿完成时,身体则垮了下来,再没有恢复的希望了……

当此病危之际,他还有多少事要做啊!应山东教育出版社之邀,主编《清史稿大辞典》,总字数为500万,已工作了近三年,完成大部,尚有余稿还在撰写中;

台湾一家出版社,屡次邀他撰著一部清帝传记,刚答应下来,未及写一个字;

我和他还有新的合作计划,正待实施;

他的三个研究生于去年考入,刚授完明史课,亟待他哺育成长……



先生创造了自己的业绩,然而尚未达到辉煌的顶点。因为他正处于事业的颠峰时期,精力充沛,以他的卓异的史德史才,精湛,的学术,一定能够也必然能够写出惊世骇俗之作,为我国的明清史研究再添光彩。

痛哉!天不假年,中道而殁。先生之过早谢世,诚为史学界一大损失,而我痛失导师,将何以弥补?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先生弥留之时,没及留下遗言,只从两个眼角处缓缓地滴下了两滴泪。他的无尽的遗憾,“天命”难违的无奈,都包含在两滴泪水之中。他匆匆地去了,身后的宏富著作,无疑是一份宝贵的学术财富;他一身清白,两袖无尘,襟怀坦荡,超凡脱俗,矢志于教育与科研事业,兢兢业业,百折不挠,为我们树立了一代学者的典范。凡有志于此者,都会从先生的事业与丰富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创造自己的美好人生!

文良先生是我读大学时明清史授业之师,积于今已逾30余年。他既是最敬爱的恩师,又是最亲密的朋友。对他的去世,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无尽悲痛。当此《洪武帝》已出清样,距先生去世还不到半个月。我隐含着哀痛和崇敬的心情,补写了这篇文章,想来不算多余,在我是想对老师的悼念,而于读者了解一位刚刚故去的知名学者,了解和认识他的学术与为人,不无益处。

文良先生的名字及其事业,将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愈显光彩。

1995年5月15日文良先生逝世20天敬书。

李治亭